

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第四十辑（总第一四〇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追忆李宗仁归来

宋 瑛

在新中国成立 16 年之际，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感召下，毅然回到了祖国。这是当年国内外瞩目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周恩来总理生前曾讲到，我们改造了末代皇帝溥仪，又争取了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回到自己的祖国，这是我们党在政治上的两大胜利！

李宗仁先生归国以后，拥护中国共产党政策，赞扬祖国的重大变化，崇敬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而且他至死不渝，认为他所选择的道路是走对了的，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精神。

我长期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李宗仁归国后，我曾具体担负着与李宗仁日常联系并陪同李宗仁外出参观的工作，直到李宗仁先生去世。今年 1 月底，是李宗仁先生逝世 30 周年，借此机会，我将所知情况整理成篇，以飨读者。

李宗仁为什么要归国

1948 年 4 月，李宗仁当选为国民党政府副总统。1949 年 1 月，蒋介石被迫引退后，他代任国民党政府总统。同年 4 月，他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反共决心。

鉴于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李宗仁自知不能去台湾，遂借口就医去了美国。1954年，他被蒋介石免去副总统职务，成为流落异乡的一介平民……

那么，李宗仁先生晚年为什么决心回到自己的祖国呢？就当时来说，我觉得主要原因是：

其一，李宗仁具有爱国思想。

李宗仁当年崇敬孙中山先生，他响应孙中山先生的主张，统一了广西，进而促进了两广的统一，为北伐奠定了基础。在北伐中，李宗仁的广西部队，打到了山海关，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在抗日战争中，李宗仁肯于和中国共产党合作，血战台儿庄，并领导所辖战区部队积极作战，建立了一定的功勋。

同时，李宗仁长期坚持反共立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犯有罪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通缉的首要战犯之一。

但是，李宗仁先生后期所追寻的，是希望看到祖国的统一和富强。

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表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内政问题，美国造成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情况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周总理的声明，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强烈愿望和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尊严和主权的严正立场，立即引起全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消息传到了美国后，李宗仁高兴异常，立即写信给程思远先生，嘱其同海外爱国人士交换意见，并替他准备一个文件，并于1955年8月，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他的建议集中地表现了他主张祖国统一的爱国思想。他在建议中谈到：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在中国人之间，如假以时日，没有不能解决的事。经过一段和平共处的时间，就可以召开一个全国会议，由自由中国人士与中国共产党试行解决他们之间的一切问题。

所谓联合国托管、中立化和两个中国的理论，作用使台湾和中国分离。这正与一般的统一倾向……背道而驰。

正是李宗仁先生的这一建议，引起了国内的注意，进而引出争取李宗仁归国的话题。

其二，李宗仁转变了态度和立场。

李宗仁在同蒋介石的长期共事中，逐渐看清了蒋介石的本性，最后与蒋决裂，分道扬镳。但是，他对于美帝国主义怀有幻想，曾企图依靠美国，搞什么“第三势力”。当这一幻想破灭之后，他不得不从新中国的实际出发，重新审视新中国发生的一切。进而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迁。而这种变迁，正是他期待的，这就使他开始转变自己的政治立场。他的这一转变，我们从1963年7月4日，他接受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的采访，所发表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说：

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我不把我的错误归咎于任何人。这些错误是我的。我不说我受骗了，他们抛弃了我。谁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而我就是提供这些理由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中国呢？

而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则写到：“我本人虽失败去国，而对北平诸领袖的日夜孜孜，终有今日，私心弥觉可喜。”

其三，李宗仁为新中国建设的迅猛发展所感召。

李宗仁在美国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百废俱举，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皆史无前例。我国百余年来战乱频仍，民穷财尽，今日幸得有此和平建设的机会，这是国家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强大的转折点。他殷切希望新中国领导人好自为之，毋蹈吾人昔日的覆辙。他个人绝不希望中国再发生内战，他通过程思远和其他渠道，坦诚地表白了他的这种心迹。

1964年有两件事对李宗仁影响甚巨。其一是戴高乐法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法两国正式建交，这标志着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外交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其二是这年10月间，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证明我国科技水平已在总体上得到了飞跃发展，国力进一步增强，至此，李宗仁先生归心愈烈。他甚至直接投书劝告美国当局效法戴高乐政府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调整关系。

其四，李宗仁不满在异国的生活。

自1954年，李宗仁被罢免“副总统”一职后，他在美国的生活很平淡。有人形容他是“贫居闹市无人问，门前冷落车马稀”。他通常是身穿一件舒适的旧羊毛衫，足登一双皮拖鞋，坐在安乐椅里看书报，面前的咖啡桌上摆着一摞当地或香港出版的报刊杂志，旁边有一杯茶。这种生活对于习惯了繁忙的政治、军事生活的李宗仁来说，自然感到百无聊赖和难耐的孤独与寂寞。另外，“叶落归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也是一种纯朴的感情。这恐怕也是李宗仁先生决心归国的一个原因。

其五，李宗仁深深感念中共中央对他的政策。

1956年，周总理便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和海外的人民，站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下面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在接见程思远时，

周总理多次向他讲过“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方针，讲明我党对李先生在原则基础上的态度和政策。同时，我党和政府对于原国民党战犯的改造和特赦，更是极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方针。对于李宗仁表示要回国的愿望，中共中央特别给予欢迎的态度。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爱国不分先后，令李宗仁甚为感念，使他解除了后顾之忧。这是李宗仁先生能下决心归国的关键所在。

毛主席、周总理欢迎李宗仁归国

李宗仁归来事宜的最早提出，是在1955年5月。当时，曾经担任李宗仁大陆时代政治秘书及国民党中央常委、正寓居香港的程思远先生随港澳代表团来京访问，与曾经在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的旧交李克农同志（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会晤。席间，程思远先生谈到李宗仁在美国的处境及其想回国的念头。5月7日，李克农同志向周总理当面作了汇报，积极建议中央争取李宗仁回国。与此同时，李济深先生也曾向中共中央建议过此事。

然而争取李宗仁归国，是一件复杂而又颇费周折的事情。其主要原因是：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之后，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但是，依然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特别是中美关系处在谈谈停停的微妙阶段。李宗仁又曾是美国某些势力企图扶持取代蒋介石的政治人物，他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存有幻想，因此，不得不提防李在美国授意下回来进行游说，离间我与台湾关系的可能。在对台政策上，当时我党中央一贯以蒋介石为对手，如贸然与李接触可能会引起对方的误解。为此，本着慎重行事的原则，党中央开始采取静观的政策。到1958年，我党中央得知李宗仁决意归来，毛主席在一份文件中批示：恩来同志，此事似可告知台湾方面，指出美国毁蒋阴谋，叫蒋注意。注意之点在美国，不在李宗仁。

从李宗仁方面来说，也有一个试探我党中央态度的过程。如他曾将自己收藏的一部分书画作品送回国，声称当年自己是花了11万美金购买的。但其实不少是赝品，按当时的价格，顶多值3000美金。毛泽东得知这件事，答应给他12万美金。并说，这是一笔政治账，我们做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要11万，就给他12万。李宗仁拿到这笔钱，很满意地说：“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

争取李宗仁归来，先后花费了10年时间。这期间，程思远同志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多次到北京，为党中央和李宗仁联系牵线搭桥。另外，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及其他一些民主人士，包括李宗仁的旧部刘仲容等，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和周总理欢迎李宗仁归国，周总理为此呕心沥血，花费了无数精力。

到1963年11月，党中央经过认真分析研究，认为欢迎李宗仁归来的时机已经成熟。周总理特意嘱咐事先向台湾当局打招呼，说明我方仅视李宗仁为爱国人士以免引起误会。程思远在由周总理当面交代任务和有关政策后赴瑞士苏黎世与李宗仁面谈。当程思远向李宗仁讲明周总理提出的摆脱“四种关系”（即“四不”：摆脱美国关系，不插手台湾问题，不和第三势力搅在一起，不介入中美关系）和“过五关”（即过好思想关、政治关、家族关、社会关、生活关）的要求时，李先生一一答应。对李宗仁的出处，周总理则提出的“四可”政策，即：（一）重回美国料理些事；（二）回来看看，住一时期再回去，保证来去自由和保密；（三）留欧，如考虑愿为祖国做些事，欢迎，经济上有困难可帮助；（四）决心回国，欢迎。李宗仁当即表态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然而，正当国内为李宗仁先生回国积极筹划之际，李又于1964年2月在美国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误解中国外交政策的文章，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不良反响。这显然与我们所要求的要其摆脱四种关系的原则相违背，为此，我们不得不对李宗仁归来的

安排延迟考虑，待这一风波平静后再做打算。

1965年2月3日，在获得李宗仁决意归来的确切消息后，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

总理：

似应欢迎李宗仁回国，去年向美报投书问题，无关大局，不加批评。因为他已自己认错了。

6月18日，程思远第五次来到北京。领受了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和全国政协秘书长平杰三等人按照总理的意见，交代了任务（当时周总理离京出访非洲14国）后，程思远即于第二天上了飞机，前往瑞士，迎接李宗仁归来。

7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调查部7月9日关于李宗仁回国有关问题的意见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

总理：

似以第二方案为好，稿子事前商量好，并无坏处。请再酌。

这里所说的第二方案，是指中央有关部门拟定的关于李宗仁回国有关问题的意见中所提到的一个方案。

这份意见说，程思远于6月28日抵达瑞士，向李宗仁转达了在京所谈各节。国内建议，为了李的安全，回国前不要在欧洲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书面声明，可在回国后再考虑。李同意这个意见，并表示将在7月20日偕其妻郭德洁同程思远一起经巴基斯坦回国。但程思远建议李一进国门就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并接见记者，说明回国原因和反帝爱国立场。我们的意见：对此可考虑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李不必一进国门就发表声明，待回

国商量后再发表声明；第二个方案，同意李一进国门就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并接见记者，但声明稿应事先同国内商妥，我们倾向采取第一方案。

7月15日，中央有关部门就李宗仁回国后发表声明问题致电我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李回国后的简短声明稿，仍请李拟定告国内。如李认为需要抵沪商量后才好拟稿，也请李决定。”

发报之前，此电报稿被送呈毛泽东审阅。15日一早，毛泽东看后，又在电报稿下面批示了两句话：

总理：

你去上海是否多留几天，同李面商声明稿，并同机回北京。李回国，你似应到机场欢迎。

可在上海住几天，商量好简短声明后再来北京。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7月17日，周总理飞抵上海出迎李宗仁。

踏入国门的政策和要求

就在李宗仁自苏黎世踏上归国旅程之际，7月12日11点整，周总理和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及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等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部分党外人士举行了一个谈话会，向党外通报了李宗仁要回来的消息，并阐述了有关方针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会议，据有关记载，参加会议的有原桂系主要人物和原南京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卢郁文、李俊龙、傅作义、黄琪翔、朱蕴山、李任仁、刘仲容、陈劭先、陈此生、梅龚彬、杨东莼、覃异之等。会议还通知蔡廷锴与刘仲华参加，他二人因为有病，没有能够出席。

周总理讲到：“李德邻先生这次回来是自觉的。过去李就提出要回来，我们怕他回来生活过不惯，劝他以后回来，主席高瞻远瞩，欢迎他回来，来去自由。”

在这个会议上，周总理主要是阐述了对李宗仁归来“四可”，尤其是“四不可”和“过五关”的政策，与有关党外人士坦诚通气。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要求党外人士协助做好李先生的工作。

且不说李宗仁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基本上是中共敌对势力的政治代表人物，就是他到了美国后，逐渐转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态度，坚持了爱国立场，决心回到自己的祖国，也不能说他从此便能适应国内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生活了。他毕竟还要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一个适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有可供他遵循的原则和尺度。“四不可”政策的提出，就是重要的政治原则和尺度。这是当时的国际斗争形势的需要，是维持和保护国内政治局面的需要，同时也是李宗仁在国内立身处世的需要。

首先，那时的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的对峙之中，而李宗仁同美国的关系很密切。李在美国生活多年，特别是在新中国诞生前后，李随着自己在政坛上的变迁，曾经倾心地依靠过美国。尽管美国没有给他什么帮助，但是，如果不摆脱与美国的关系，出现对美国仍然抱有幻想言行，以他的影响，是要惹出麻烦的。与此相联系的是不做中美关系的桥梁，就是说，鉴于李宗仁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不宜于由他出面在中美关系上做什么事情。

其次，当时的海峡两岸也正处于紧张的对峙之中。李宗仁和台湾当局是一体化的政治关系，结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李宗仁的归国，台湾当局极为敏感。特别是李宗仁曾经从他的角度反对过蒋介石，是蒋的政敌。如果由李宗仁来插手台湾问题，必然要导致海峡两岸关系的复杂化。其实，李宗仁归国这件事情本身产生的影响，就已经使台湾当局够紧张够头痛了。为了防止海峡关系的复杂化，正如周总理所说，已经告诉了台湾当局，我们不会

利用李德邻反蒋。所以，李宗仁归国后，不能插手台湾问题。

就“第三势力”的问题来说，李宗仁曾经热心于此，在这上面花费过不少精力。后来，他组织“第三势力”的活动失败了，他也从中吸取了教训。但是，既然是要归国定居，理所当然要彻底断绝这种念头，不能再搞“第三势力”，走什么“第三条道路”了。

实践证明，这“四不可”，不仅在李宗仁归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李宗仁归国以后，更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李宗仁回到祖国，要适应国内的政治生活，必然遇到这样五个方面的问题。周总理提出的“过五关”，是对李宗仁在政治上的爱护和关心。

根据周总理阐述的关于李宗仁归国的有关政策和要求，后来，中共中央曾经专门发了一个文件，向全党通报李宗仁回国有关情况。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总理来到了上海。在如期迎接到了李宗仁后，7月19日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周总理与李宗仁进行了一次长谈，周总理又当面向李宗仁交待了“四可”、“四不可”和“过五关”的政策要求。李宗仁诚恳地全部接受了周总理的意见。

7月20日，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女士，在程思远的陪同下，终于回到北京。在机场，周总理安排了非常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及国民党起义将领、当年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等100多人到机场欢迎李宗仁夫妇。

机场大厅里，李宗仁先生庄严地宣读了他的声明。

他说：“16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爆炸成功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成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

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他说：“我深望海外侨胞和各方面人士也应该坚决走反帝爱国的道路。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歉疚，此后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一误再误。经此教训，自感作为中国人，目前只有两条道路可循：一就是与中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一就是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为时代所背弃，另外没有别的出路。”

最后，他殷切希望留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凛于民族大义，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

李宗仁的这个声明，是符合中央对他的政策和要求的。

7月20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隆重设宴欢迎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

7月26日，毛主席在游泳池接见了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先生，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其中有些对话很是精彩——

毛泽东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李宗仁说：“我们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首先应对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

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蒋介石比你高一级，你是他的部下，他回来我们更欢迎。”

李宗仁说：“在美国有许多的中国科学家，感到凄凉、苦闷，怀念祖国。”

毛泽东见李宗仁深以台湾问题为虑，安慰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李宗仁诚恳地表示说：“主席讲得对！”

李宗仁说：“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

毛主席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还得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我建议你到祖国的各地看一看。”

.....

7月31日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副主席董必武和夫人何莲芝、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并宴请李宗仁和郭德洁夫妇。陪同的有徐冰和夫人张晓梅，及罗青长、刘仲容等人。

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以及各界人士也都分别举行宴会，对李先生的归来，给予了隆重而热烈的欢迎。

空前盛大的记者招待会

李宗仁归国后，首先的一项大的活动，是他和夫人郭德洁、程思远等到东北参观访问，同时也是为了认真准备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稿。他到了哈尔滨、齐齐哈尔和大庆油田，游览了景色秀丽的松花江，又到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抚顺、鞍山、旅大等城市的工厂、矿山、学校。此行得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热情接待和妥善安排，使他所到之处，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对于祖国建设的大好形势，李宗仁先生说：“百闻不如一见，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得多。”

9月26日下午3时，李宗仁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举行盛大中外记者招待会。我当时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记者招待会。我深感，李宗仁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是他爱国思想的一次集中

表现。

来自世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名中外记者出席了招待会。其中有首都的中外记者，有 60 多名港澳中外记者，还有国庆前夕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各国记者，以及各国驻华使馆的新闻官员。到会的新闻界人士之多，招待会规模之大，为建国以来所未有。

招待会开始，李宗仁发表了简短的发言，他说：

“今天承蒙各位参加这个招待会，乃出自我个人的意见，并得到政府的同意和支持。我当初所以有此建议，是因为我在海外时，曾看到了许多反动报刊对我国发表了许多诬蔑和歪曲的报道。……等我回国以后，看到了许多情况，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深感我国现状有向各界说明的必要，所以特请各位来到这里，听听我回国两个多月的亲身感受和此次东北之行所得的观感。……”

接着，会议首先散发了李宗仁事先准备好的谈话稿，并由程思远先生代他宣读。这个谈话稿很长，其中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李宗仁都有了明确的态度。比如：他说，经过两个月来的体察，最感奋的是祖国的现状与旧社会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对比。“目前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不仅为百年来所未有，且为中国史无前例的新气象。”

他说：“孙先生所创立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理想已完全实现。现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向前迈进。事实上已超过孙先生当年的理想。”

他还列举了他在东北地区参观所见所闻，得出结论说：新中国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超过了他在美国时所想象的百数十倍。16 年便有此巨大成就，是世界罕见的奇迹。

他说：“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受尽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侮。帝国主义者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但是现在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六亿五千万人民已经完全觉

醒，团结得像一家人，显示出空前无比的威力。现在我们不是‘病夫’了，而是巨人了！我这个 75 岁的老人也感到很自豪！”

他表示，今后“深愿在党领导之下，与全国人民一道，为爱国反帝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李宗仁最后说：“宗仁在海外住了 16 年以后，终于回到祖国怀抱，走上了一条爱国反帝的道路，并认为这是吾辈国民党人今后唯一可能抉择的光荣的道路。”他“深望台湾国民党同志和海外各方人士认清民族大义和大势所趋，不要一误再误，毅然奋起，相率来归，为祖国最后统一作出贡献。”

随后，李宗仁答记者提问。

面对众多记者当面提出的各种问题和递交的书面问题，李宗仁综合说道：

“一个朋友提出关于台湾与蒋先生的问题，他提出问题时说‘蒋介石’，我觉得我很尊重蒋先生，应该加‘先生’两个字。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对于台湾如何解决，中国早已宣布中外。我觉得目前蒋先生的处境很尴尬，很难过，我深望蒋先生同台湾的国民党同志好自为之。

另一位朋友问我，你感觉 16 年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所谓突出变化是指哪一类呢？我很不客气，并且很大胆地奉告各位先生，突出的特点不是一桩，太多了，不胜枚举。我在‘谈话’中已有详细报告，不过我还觉得太简略了，因为感想太多了！各位先生如有兴趣，如不相信，可以效法我到各地考察，各位的发现可能比我更深刻更多，这也难说。

另一位刚果（布）朋友要我答复他关于我回国的动机，我可以奉告各位，关于这个问题我在 7 月 20 日的声明和今天的‘谈话’已讲得比较详细，恕不答复了。他还问我，你是什么主义呢？你在‘谈话’中说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那你李某是什么主义啊？我没有其他的主义，我是爱国主义者。

香港一位记者问道关于香港夜报刊载我派人赴香港活动的

事，这件事连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很滑稽。不过，这家报纸问得很聪明，因为现在香港群众注意李某人的言论，他捏造这些消息，可以多卖几份报纸。我很原谅它。”

其后，李宗仁说：“另一位记者提到我在美国有多少钱给儿子的问题，我觉得这位朋友记者水准恐怕有点问题。我的事情太多了，不仅钱的问题，连我的起居饮食，这位朋友恐怕都要问到，恕我不答复。”

对有的记者问到李对印度侵略巴基斯坦的看法，问到他对马来西亚是否会成为英国殖民地的看法等等问题，李宗仁回答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支持政府政策。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个问题在屡次的社论和新闻中，早已说得清清楚楚了，恕我不答复了。

“另一个朋友关心我回国怎样打算的问题，我回国已两个多月了，到了东北参观，深感 16 年来祖国变化很大，需要多看一看，多了解了解，然后根据祖国的需要来报效祖国，有一分力量就作出一分贡献，至于个人出处，无所萦怀。我此次参观旅行，体重增加。深感多参观地方建设，顺便游山玩水，是颐养天年的最好办法。

有的记者问我是否愿意赴台湾的问题。当然，台湾问题是个内政问题。我们政府已屡次声明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同蒋先生尽管在几十年中意见相左（意见不同是很寻常的），但并无个人仇怨。如果蒋先生的确出于诚意，要解决我们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

这次记者招待会记者们提问踊跃，兴致很高，可谓盛况空前。李宗仁特别兴奋，答话也妙语连珠，诙谐横生，被港澳记者称赞为“对付记者的能手”。

1965 年 12 月 2 日中午，李宗仁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对他从海外归来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和亲切关怀，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以

及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表示谢忱。

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彭真副委员长，贺龙副总理，程潜副委员长，叶剑英副主席，全国政协徐冰、蔡廷锴、李四光、傅作义、许德珩副主席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应邀出席了宴会，周总理在宴会上祝酒。

李宗仁在宴会上说：宗仁回国以来，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热烈欢迎和接待，是过去前所未有的光荣。另外又承民主党派负责人盛情款待，也使我深深感到荣幸。

他说：在过去四个多月中，宗仁深感我国上下一心，在党的周围团结起来，政治上出现了一种兴旺蓬勃的气象。同时我看到祖国经济建设飞跃发展，前途一片光明。犹忆孙中山先生 1905 年在东京一个欢迎会上讲过我国必能赶上西方的预言，深信我国可在不久的将来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重游两广旧地，“愧煞当年王与侯”

1966 年 1 月 7 日，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在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的陪同下，和程思远与夫人石泓、旧友刘仲容与夫人同机起飞，到广东和广西参观访问。我随同担负具体组织和安排工作。

中央很重视李宗仁先生回国后的礼遇和接待等方面的工作，在内部曾发过通报，使各地负责同志了解中央的精神。经过在北京的诸多的宴请活动和记者招待会后，李先生回国初期的活动已经告一段落。中央统战部和有关部门曾全面研究过李先生的工作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一项重要的安排，就是继续组织他到外地参观活动。这既是中央的精神，也是李先生本人的意愿。不能不看到李先生在美国侨居 16 年，尽管对新中国的发展变化知道一些，但终归不是身临其境，而在美国听到的大部分都是攻击诬蔑新中国的。李先生回国后接触到了党内和党外的负责人